

中國的教育思想

劉真

一 教育在中國文化傳統中的重要性

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的教育，莫不與其民族文化具有密切的關係。因為教育不僅是文化內涵的一部分；而且也是文化所賴以延續與創新的動力。尤其就中國的歷史來看，教育在我們民族文化傳統中，更居於特別重要的地位。這可用以下兩項最顯著的事實，加以說明：

(一) 我們中國是世界上最重視教育的國家

凡對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稍有瞭解的人，一定都會承認：西方人以宗教為精神生活的支柱；而中國人則視教育為民族生存的命脈。兩者文化的重心，顯有不同。由於我們的先民很早便知道教育的重要，所以遠在三四千年以前，政府便開始負起教育人民的責任。(註一)到了二千多年以前的漢代，我們更有規模相當完備的大學；(註二)政府並且給與學生以極為優厚的待遇。但在西方國家，不僅政府致力於國民的教育為時甚晚，即歐洲幾所最古老的大學，也不過只有千年左右的歷史。(註三)而且多係由教會主辦，與政府之間，甚少直接關係。從以上這些事實看來，可知世界上幾乎沒有一個國家，是像我們中國自古迄今始終如此重視教育的。

(二) 我們中國是世界上最尊敬教師的國家

因為中國的政府特別重視教育，所以教師所從事的教育工作，便被視為一種最清高最神聖的事業，而與社會上的普通行業有所不同。不僅一般人常將「天、地、君（國）、親、師」五者並列，成為民間供奉膜拜的對象，即在帝王時代的儲君，對其業師也常侍立聽講，以示崇敬。孔子二千多年以來之所以能受到普遍的信仰，便是由於他生前教育的成功，樹立了萬世師表的典型。現今政府並已明定孔子的生日為全國共同慶祝的「教師節」，更是紀念孔子與尊敬教師的具體表現。但是反觀西方文化發源地的歐洲，其教師地位向來最為低下。「希臘時代是以奴隸充當小學教師。到了十八世紀中葉，師資地位並無多大改善。歐洲各國地方學校，仍以裁縫、木匠、理髮匠等人充任教師。」（註四）實則不僅西洋古代視教師為「教僕」；即時至今日，歐美各國社會上「尊師」的觀念，亦仍極為薄弱。這與我們中國比較起來，實有顯著的差別。

我們知道：世界文化之所以能進步到今天的程度，乃係人類生活經驗繼續不斷累積的結果。教育的主要功能，即在促成此種生活經驗的傳遞與更新。我們中華民族因為特別重視教育，故歷代政府與民間，無不力謀教育事業的發展。同時又因特別尊敬教師，故為教師者亦均能薪火相傳，負起繼往開來的責任。由於我們中華民族具有這種優良的傳統精神，所以五千年來，我們的文化不僅能一脈相承，歷久彌新；而且我們文化的內涵，也較世界上其他古老的民族，更為充實而光輝。

二 中國教育思想的演進

(一) 先秦的教育思想

前面已經說過，中國是世界上最重視教育的國家；所以中國很早便有一種極崇高的教育理想。依據我們現有的「紙上史料」和「地下史料」的推斷，殷代已有相當高度的文化。孟子滕文公篇中曾說：「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足見當時不僅有各種學校的設置；而且還以「明人倫」為設校的主旨。所以我們可以說：中國自三代開始實施一種正式的學校教育以來，我們便樹立了以倫理為中心的教育思想。

西周繼承殷代的文化，特別注重禮樂的教育。禮記文王世子裏曾說：「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修內也；禮所以修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這種禮樂並重的教育，可以說便是倫理教育思想的實踐。

東周包括春秋戰國兩個時期，是中國學術思想發榮滋長的黃金時代。這一時期雖產生許多不同的思想派別，但其中最重要的當推儒、道、墨三家。就教育思想而言，老子（約與孔子同時）所代表的道家，主張「禁慾」與「絕學」，亦即反對情欲的生活與主知的教育，強調人類應排除物質的慾望，歸返自然的境界。老子這種忽視人類本性與社會環境的主張，可以說是一種難以實現的理想。墨家的代表是墨子（約為西元前四九二——四四一年），以教人「法天」與「兼愛」為其中心思想，提倡「

非樂」與「節用」。惟以墨家思想含有神祕主義的色彩及矯枉過正的偏失，致不易為世人所理解與接受。所以在春秋戰國時期各學派思想對後世教育影響最大的，只有孔子所代表的儒家。

孔子名丘，字仲尼，魯國人，生於周靈王二十一年，卒於周敬王四十一年（西元前五五一——四七九年）。二千多年以來，一直被稱為「德配天地、道貫古今」的大教育家。

孔子認為人生的意義在於「行仁」，而教育的目的，即係培養「仁者」。怎樣才能成為仁者呢？孔子說：「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所謂能近取譬，亦即推己及人的意思。要使每個人都有推己及人的善良的動機，就必須重視道德教育。故云：「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汎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足見德行比知識更為重要。

孔子當時教育的內容，據論語所載，為「文、行、忠、信」的「四教」。分析起來，只是文與行兩教。因為忠信亦是屬於行的。文的方面係以詩、書、禮、樂四者為基本學科，行的方面，則係以忠信為主。可見孔子所實施的教育，包括讀書（文）與修德（行）兩方面，亦即一種知行並重的教育。

孔子的教學方法，也有很多特色，如：（一）因材施教。嘗云：「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二）注重啟發。嘗云：「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三）人格感化。嘗云：「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四）學思並重。嘗云：「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因為孔子對弟子能針對各人的個性，施以不同的教育，同時隨時啟發其學習的興趣，培養其思考的能力，並以身作則，潛移默化，所以孔門許多弟子都有很大的成就，成為當時各方面重要的

人物。

此外，孔子在教育思想上具有劃時代影響的，乃是他的「有教無類」的主張。孔子以前，學術集於王官，只有少數貴族可以接受高深的教育，使學術的研究，成為貴族的專利。自孔子主張有教無類以後，各國有志之士，不論係何出身，皆來問學，相傳孔子的弟子，前後凡三千人。在中國教育史上，由於孔子的杏壇設帳授徒，廣施教化，成材甚眾，遂使民間的私人講學，蔚然成風。也可以說，自孔子以後，中國的學術才漸漸平民化了。這不僅是中國教育上一大革命，而且也是中國政治上一大進步。因為政治上的平等，實基於教育上的平等，一般平民有了受高深教育的機會，於是透過一種公平的考試制度，「學優則仕」，才逐漸的可以參與政治；而所謂「布衣卿相」，也始有產生的可能。教育權與政治權既然公開於全體人民，貴族與平民便不致永遠成為固定的對立的階級，西方國家歷史上由於平民與貴族壁壘森嚴所引起的流血革命事件，在中國便很少發生。這也就是孔子在教育思想上的影響，促成了中國政治上的進步。

孔子思想學說的主要繼承者是孟子。孟子名軻，字子輿，生於周烈王四年，卒於周赧王二十六年（西元前三七二——二八九年）。他的教育主張，完全基於其「性善論」，亦即謂：人類的本性都是善的，其所以尚有為惡者，乃係由於自暴自棄或環境影響，致天賦的本性（善端）不能發展出來。所以教育的目的，即在使人對於「養性」「盡心」「尚志」等方面多下功夫，以保存與擴充此天生的善性，使能與禽獸有所區別。在方法上，則在教人發揮自動自律的精神，培養高尚的品格，成為所謂君

子和聖賢。

孟子為使孔子所說的「仁」更易為人所理解，特別把孔子常常分開來講的「仁」字和「義」字，併為「仁義」一詞，加以闡揚。孟子以為仁係心之本體，義係心之作用，故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孔子所說的「仁」，固然可以包括孟子所說的「仁義」，但因有孟子的引伸闡發，遂使孔子仁的中心思想，更為具體而充實。所以唐代的韓愈曾說：「自孔子後，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

孟子歿後約五十餘年，儒家出了一位學說與孟子恰恰相反的思想家，那便是主張「性惡論」的荀子。荀子趙人，生卒確實年代，各家說法不一。他認為人類生來便有「好利」「爭奪」「疾惡」「好聲色」等情慾，故謂「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不過荀子所說的「偽」，乃是「人為」的意思，與虛偽之偽不同。因為人的本性是惡的，所以教育的目的，便是教人以禮義法度，節制情慾。同時，從「積善」、「有恒」、「慎選師資」、「利用環境」、「征服自然」等方面入手，以改變人類惡的本性，發揮「化性起偽」的效能。

從現代教育學的觀點來看，孟子是偏重於先天遺傳的，荀子是偏重於後天環境的。兩人的觀點雖有不同，但對教育的重視並無二致。而且就教育可以變化氣質一點而言，毋寧說荀子更強調了教育的價值。近人常以孟子荀子與孔子的關係，比之於希臘哲人柏拉圖、亞里士多德與蘇格拉底的關係，足見荀子在儒家中所佔地位的重要。

(二) 漢唐的教育思想

荀子以後，漢代的董仲舒，對中國的教育思想，也發生了極大的影響。董仲舒生於漢文帝元年，卒於漢武帝太初元年（西元前一七九——一〇四年）。未仕前潛心學術，傳說曾三年目不窺園。武帝時以所進「天人三策」，有聲於時。他在天人三策及所著「春秋繁露」一書中，曾特別強調教育的重要性，如云：「漸民以仁，摩民以義，節民以禮，教化行則習俗美。」又謂教育人民為政府應盡之責任，應設立大學以養士，曾云：「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教化之本原也。」董仲舒對中國教育影響最大者，乃是他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主張。從此儒家的經典成為國定的標準教科書，孔孟學說也一躍而居於正統的地位。他的「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的名言，更闡明了儒家注重動機的道德論的精義。

董仲舒是西漢儒家一位正統派的人物，到了東漢，卻出了另一位高唱革新論調的思想家，那便是王充（西元二七年生，卒年不詳）。充字仲任，所著「論衡」八十五篇，最為有名。他富有懷疑精神，反對「迷信」與「尊古」。他對人性的看法，比較接近荀子。認為「人之性善，可變為惡；惡亦可變為善。」所以在教育方面，他主張應培養學者創造的精神，嘗謂：「著作作者為大儒，說經者為世儒。」一切知識應源於觀察，成於思考，決不能憑空虛構。如云：「凡論事者，違實不引效驗，則雖甘義繁說，眾不見信。」他認為教育的目的，在使惡性變為善性，而其方法，則有賴於禮樂。他說：「情性者，人治之本，禮樂所由生也。故原情性之極，禮為之防，樂為之節。性有卑謙辭退，故制禮以

適其宜；情有好惡喜怒哀樂，故作樂以通其敬。」可見王充認為禮樂可以陶冶情性，制止衝動，導人於善。所以王充雖對當時儒生過度崇信孔孟學說有所批評，然其基本思想，仍未脫離儒家的範疇。

東漢滅亡以後，三國鼎立，繼之則為魏晉南北朝紛爭擾攘的局面。在此期間，佛教與道家思想因較能滿足厭亂的人心，遂得與儒家思想同時流行於社會。當時一般知識份子多以「清談」或「玄說」，為其個人「安時處順」與「全性養生」之道，甚少注意到國家社會的實際問題。在教育思想方面，僅晉朝的傅玄和北齊的顏之推，尚有一些片段的言論（如顏氏家訓之類），但亦並未對教育發生實際的影響。洎隋唐統一天下，當時的儒家為抵制外來的佛教思想，乃積極提倡儒家的經學。此一時期的主要人物，便是王通與韓愈。

王通生於隋文帝開皇七年（西元五八四——六一八年），字仲淹，門人謚為文中子。所作王氏六經，未傳於世。其弟子輯其語錄為「中說」一書。他在教育方面，主張應注重心性修養與勞作教育，嘗謂「化人之道，在正其心。」居常親自耕作以自養，他的重義輕利的思想，與孟子及董仲舒頗為相近，如云：「君子之學進於道、小人之學進於利。」王通歿於隋大業十年，雖盛年凋謝，然其思想教澤，對當時曾發生很大的影響。也正如「學記」所謂：「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了。

韓愈（西元七六八——八二四年）字退之，因先代為河北昌黎人，故世稱韓昌黎。他生於唐代佛教極盛之時，起而闢佛，有如孟子之拒楊墨。平生以繼承光大儒家之傳統自任。在教育方面，他認為教育的目的，在明先王之道，教師的責任，在傳道授業與解惑，將傳道作為教師的第一任務而置於授

業解惑之上，意即謂正確思想的樹立，較知識技能的獲得更為重要。他又以為無論上智或下愚，皆可施以教育。嘗謂：「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也。」可見他對教育效能的肯定，更是超過以前的儒家的。

(三) 宋明的教育思想

宋代的第一位教育家是胡瑗（西元九九三——一〇五九年），世稱安定先生。瑗字翼之，江蘇如皋人。初任蘇州湖州學教授，後應聘主講開封國學。曾制定「太學學令」，精密詳備，遠超前代。他將太學分為經義治事兩齋，太學生「治一事兼攝一事」，對「治民」「講武」「水利」「算歷」等項，分組研習，實為我國大學兼重通才與專才教育之嚆矢。瑗認為教育應以明體達用為主，除經術外，並注意生活及休閒教育。在學時，公私試罷，輒以雅樂詩歌與學生同樂，暇則親率學生習射投壺，遊覽名勝。程伊川對瑗敬禮備至，嘗語人曰：「從安定先生遊，有醇厚和易之氣，一望而知。」其感人之深，由此可見。

宋代較胡瑗稍晚一點的思想家，有周敦頤（西元一〇一七——一〇七三年）張載（西元一〇二〇——一〇七七年）和程顥（西元一〇三二——一〇八五年）程頤（西元一〇三三——一一〇七年）等人。這些被稱為理學家或新儒學派的思想家中，以張載和二程對以後所發生的影響最大。張載字子厚，世稱橫渠先生。所著「西銘」，言簡義深。在教育方面，他以為教育的目的在變化氣質，而去惡趨善，有賴乎禮，故學禮最為重要。人在幼年時，即應養成正當的生活習慣，曾有「蒙以養正」之語。

他主張教者必須了解學生的個性，並使學生養成勇於懷疑的精神。如云：「教人者必知至學之難易，知人之善惡……仲尼所以問同而答異者以此。」又云：「在可疑而不疑者不曾學。」他認為疑乃有思，思則易進，因疑求解，始獲真理，這與孔子學思並重的主張，完全符合。

程顥和程頤雖係兄弟，然其基本思想，卻不相同。兄顥字伯淳，世稱明道先生。弟頤字正叔，世稱伊川先生。明道主忘內外，重自得，以良知良能為本。伊川主經驗，重窮理，以格物致知為先。在教育方面，明道以為教育的目的在教人懂得「仁」的道理（識仁），其方法則為打破人物界限，內外兩忘（內指己，外指物）。但要忘內外，則須從主敬入手。敬的功夫修養到極處，則心地清明，可與天地萬物同體，達到仁的境界了。伊川以為教育的目的，在教人學為聖人。怎樣才能成為聖人呢？他除和明道一樣，重視主敬的功夫外，並特別強調窮理與寡慾的重要。他認為窮理始能集義，集義始能處事得當。寡慾則可去昏塞之患，養清明之氣。二氏在教育上的主張，雖未盡相同，但對知識與道德的同等重視，則是一致的。

二程以後，宋代一位最重要的教育家是朱熹（西元一一三〇——一二〇〇年）。熹字元晦，號晦庵。學宗伊川，自成體系。秦漢以後的儒家學說，到朱熹又完成了一次集大成的工作。他以為教育的目的，在窮理盡性，學為聖賢。嘗謂：「凡人須以聖賢為己任。」至於教育方法，則主張要使學生能立志與力行。如云：「為學須先立志，志既立則學問可以次第著力。立志不定，終不濟事。」又云：「學之之博，未若知之之要；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實。」同時，又謂人貴能立能創，嘗云：「學貴

獨創，守舊無功。」他在白鹿洞書院的教條中，特別指出明五倫的重要，並以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為入手門徑。此外，他對小學教育非常注意，曾彙集古代經典有關資料，編成「小學」一書，以為教育兒童之準則。他在教育方面影響後世最大的，是將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合為一書，加以註解。「四書」一名，即自朱熹始。自元明以迄清末，四書成為全國國民必讀的書籍，政府並規定以朱子四書集註，為科舉考試命題的依據。近人蔡元培嘗謂「宋之有朱晦庵，猶周之有孔子。」其對朱熹的推崇，可稱允當。

宋代和朱熹同時而思想學說與朱熹分道揚鑣的為陸九淵（西元一一三九——一一九二年）。九淵字子靜，講學於貴溪之象山，世稱象山先生。象山之學，淵源於明道。他以為教育的目的在於明理。嘗云：「塞宇宙一理耳。學者之所學，要明此理耳。」至教育方法，則在使學生自立以見其大，靜坐以存本心。並注重思考，以定是非取捨。嘗云：「義理之在人心，實天之所興而不可滅者也。彼其蔽於物，而至於悖理違義，蓋亦勿思焉耳。誠能反而思之，則是非取捨，自有隱然而動，判然而明，決焉而無疑者矣。」朱熹與陸九淵成為宋代理學兩個不同的重要派別，他們兩派思想的特色，清代黃宗羲曾加以評述謂：「象山之學，以尊德性為宗，謂先立乎其大，而後天之所為我者，不為小者所奪。夫苟本體不明，而徒致力於外索，是無源之水也。紫陽之學則以道問學為主，謂格物窮理，乃吾人入聖之階梯，夫苟信心自是，而惟從事於尊思，是師心之用也。」朱陸因思想重心不同，故其教育主張，亦自難一致。

元代繼宋之後，中國在蒙古民族將近百年的統治之下，學術思想方面並沒有重要的發展。比較著名的學者僅有許衡（西元一二〇九——一二八一年）吳澄（西元一二四九——一三三三年）鄭玉（西元一二九八——一三五八年）陳苑（西元一二五六——一三三〇年）等人。其中只有許衡曾對教育有所主張，他認為教育的真正目的，在教人做人而不在教人做官，學者應以治生為先務。

明代在學術思想方面居於領導地位的是王陽明（西元一四七二——一五二八年）。陽明原名守仁，字伯安，浙江餘姚人。他的思想比較接近象山，後世遂以陸王並稱。在教育方面，他以為良知是教育的根本，而致良知則是教育的目的。致良知的方法在誠意格物與知行合一。嘗云：「君子之學，誠意而已矣。」又云：「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外無行，行外無知。」陽明認為世人不能致良知的主要病根是過重功利。他在所著「拔本塞源論」中曾說：「聖人之學，日遠日晦，而功利之習愈趨愈下。相矜以知，相軋以勢，相爭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聲譽。記誦之廣，適以長其傲也。知識之多，適以行其惡也。聞見之博，適以肆其辯也。辭章之富，適以飾其偽也。」所以他以為教人須使學者先除去自私自利的念頭。可見他之所謂誠意格物，便是動機純潔，為善去惡。知行合一乃是將知行看成一事，不可分而為二。陽明對於教學方法，特別注重適應兒童身心的發展。如云：「童蒙之性，樂嬉遊而憚拘束，如草木之萌芽，舒之則生長，撓之則衰萎。故教兒童，鼓舞其趨向，喜悅其中心，則日進而不已。譬如草木之霑時雨春風，則萌動而長；剝落冰霜，則蕭瑟而枯焉。」陽明在當時而能有如此合乎現代教育原理的主張，實不愧為一位偉大的思想家。

(四) 清代以來的教育思想

明末清初之際，在學術思想方面的代表人物，如孫奇逢（西元一五八四——一六七五年）顧炎武（西元一六一三——一六八二年）黃宗羲（西元一六一〇——一六九五年）王夫之（西元一六一九——一六九二年）顏元（西元一六三五——一七〇四年）李恕谷（西元一六五九——一七三三年）戴震（西元一七二三——一七七七年）等人，他們大都不滿宋明理學末流的空疏之弊，起而提倡經世致用之學，其中尤以顏李一派，最為激烈。在教育方面，奇逢特重做人之道，如云：「古人讀書，取科第猶第二事，全為明道理，做好人。」又云：「前有千古，以身為承；後有千古，以身為垂。」炎武以為教育應使學者在「博學於文」和「行己有恥」兩方面下功夫，前者屬「知」，後者屬「行」。他所謂「文」，是指宇宙間一切現象。嘗謂：「自一身以至於天下國家，皆學之事也。」他又認為：為學最重培養人格，如人格不立，一切學問均屬無用。而培養人格之道，在能先知恥。嘗云：「士不先言恥，則為無本之人，非好古而多聞，則為空虛之學；以無本之人而談空虛之學，吾見其日從事於聖而去之彌遠也。」宗羲認為教育應以致用為目的，以修德為根本，以博讀經史為治學的方法。夫之係從史學的研究中，轉而注意實用之學，他以為教育應使學者窮理篤行，期能止於至善。顏元及其弟子李恕谷，世稱顏李學派。他們對宋明的理學，漢儒的訓詁，魏晉的玄說，釋老的虛無，一概予以排斥。他們以為一切學問，離開實用，即無價值。故反對記誦的教育，輕視書本的知識。顏元更特別強調實習與力行的重要，並名其所居曰「習齋」。顏李這派的教育思想，因過於趨向另一極端，致不易為一

般囿於傳統觀念的知識份子所接受。顏李以後的戴震，對宋明理學家所謂「理」「欲」二元或「理」「欲」對立之說，極為反對。他認為情欲與生以俱來，無法加以完全遏止。教育的目的，即在使人本諸理性，調節情慾，導其歸於正途。關於治學方法，戴震以為學者必須有獨立思考的精神，善於懷疑，無徵不信。嘗謂：「學者當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不為一時之名，亦不期後世之名。有名之見，其弊二：非培擊前人以自表暴，即依傍昔賢以附驥尾。」他這種客觀的求真的治學精神，充分表現了清代所謂「樸學」的特色。

戴震以後的清代一班學者，很少在教育方面有其獨特的見解。自清末變法維新以迄今日，在這短短不到一百年的時間，教育思想上卻發生了急劇的變化。由「中體西用」到「徹底西化」到「三民主義」的教育思想，便是這一階段歷史發展所經歷的過程。不過「中體西用」與「徹底西化」等教育思想，只是清末民初少數政治人物與知識份子為雪恥圖強所提出的主張，並未在教育實際上產生重大的影響。只有國父中山先生（西元一八六六——一九二五年）所創造的三民主義，自清末國父倡導革命以來，不單是中國政治上最高指導原則，同時也是我們教育方面的中心思想。

我們知道，國父的三民主義教育思想，一方面有偉大的創造性，另方面還有豐富的綜合性。例如「清末提倡的兵工教育、西藝教育，與民初以後的國家主義教育等思想，即先後匯流到民族主義的教育思想。……民初的國民教育、全民教育，與民主主義的教育思想，亦都先後匯流到民權主義的教育思想。……民初流行的實利教育、職業教育，及其後的科學教育與生產教育思想，亦都無不匯流到

民生主義的教育思想。故三民主義教育思想在實際上不只為中國今後全部教育的教範，且亦為中國近代全部教育改造的準繩，意義實為無比的豐富與深遠。」（註五）

國父教育思想之所以有這樣大的涵蓋性，乃是因為 國父的三民主義不是憑空造出來的。據 國父自己說：他的思想淵源有三：一是中國的傳統思想；二是歐美的學說事蹟；三是獨自創獲的真理。

（註六）至於何謂中國的傳統思想， 國父在答復第三國際代表馬林時曾說：「中國有一個道統，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相繼不絕，我的思想基礎，就是這個道統，我的革命，就是繼承這個正統思想，來發揚光大。」（註七）不過 國父思想雖與傳統的儒家思想一脈相承，但過去儒家思想僅只著重於倫理道德一方面，而 國父除主張恢復民族固有道德外，更同時提倡民主與科學，亦即 國父的三民主義，乃是倫理民主科學三者結合的整體，中西文化的結晶。

從 國父遺教中，我們可以看出 國父一生革命的目的，乃在「平人類之不平。」（註八） 國父認為要想使人民在政治上有平等的地位，必須先使人民受教育有平等的機會，也可以說，教育機會平等是政治機會平等的基礎。所以在教育方面， 國父最重要的主張，就是要促進國民教育機會的平等。至其具體辦法，則為「量智施教」與實施公費教育。這種崇高的教育理想，充分表現了 國父革命的與創造的精神。

國父革命大業的繼承者是 蔣總統（西元一八八七——）。 蔣總統在教育方面，不僅積極致力於 國父遺教的實踐，而且他的教育思想，似較 國父更進一步。他認為三民主義教育的本質，固為

倫理民主科學三者，但「民主與科學的教育，必須以民族倫理教育為其基礎，為之中心，而後此二者方能發生學以致用之功效，對國家乃能有其貢獻。這樣民主與科學之教育，方不致落空。」（註九）足見特別對於倫理教育的重視。為補充 國父民生主義未完成的部分， 蔣總統曾於民國四十一年十一月手著「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一書，將其個人的教育思想，構成一充實完美的體系。

蔣總統對教育的意義，有一種新的看法，曾謂：「就字義上分開來說，教就是教導，育就是養育，合起來講，教育就是一面教導一面養育，教和育要兼行並施，才合乎教育的本義。」（註十）至於教育的目的， 蔣總統以為一切都不能不以「人」為中心，現代化的教育建設，便是以「建人」為中心的一種國家建設，亦就是培養三民主義新中國的國民。（註十一）此外，在教育方法上， 蔣總統以為不但要身心平衡、手腦並用、文武合一、術德兼修，而且「教」「學」「做」也應連在一起，不能分離。使學生能由知而行，行以求知，即知即行，即行即知。以求理論與實際結成一體，充分發揮教育的效能。

由上所述，可知 國父和 蔣總統的教育思想，實在是匯集了中國傳統教育精神與西方現代教育理論的精華。就中國數千年來教育思想的發展而言，由專重「倫理」的儒家教育思想演進到兼重「倫理」「民主」「科學」的三民主義教育思想，可謂已臻於「適乎世界潮流，合乎人群需要」（註十二）的完美境地了。

三 中國教育思想的要義

根據前節所述，我們可知數千年來的中國教育思想是順著一個主要系統不斷充實和開展的。孔子集三代學術思想的大成，奠定了儒家學說的理論基礎。自先秦以迄清末，教育思想始終以儒家學說為主流。國父於清末國勢岌岌之際，繼承了中華文化的一貫道統，並吸取西方文化的精華，創造了三民主義，集中西學術思想的大成。從此三民主義便成為中國現代教育思想的中心。孔子和國父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兩位先後媲美之最偉大的聖人。

因為中國的教育思想，有其一貫的體系，故在數千年來的各種重要教育學說中，不難尋出一些共同的基本要義。茲特加以分析歸納，扼要說明如下：

(一) 人性為本

教育既係以人為對象，故不能不先瞭解人性。儒家自孔子開始，便注意到人性問題。孔子主張「性相近」，孟子主張「人性善」，荀子主張「人性惡」。其後歷代儒家也有主張「人性可善可惡」和「人性善惡混」的。到了國父中山先生，認為人性是人之所以為人的本性，係由獸性進化而來。既係由獸性進化而來，自不同於禽獸，這與孟子所謂人與禽獸相異的看法頗為相似。因為中國幾千年來多數思想家均是主張人性善的，所以在教育方面，大都認為教育的目的，在發展人性，培養人格。例如：中庸首章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大學開宗明義也說：「大學之道，在

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可知中國自古以來所謂教育的主要功能，就是要使人類別於禽獸，遠異物種，把天賦善性充分發揮出來，自覺人之所以為人的道理（即盡性，止於至善之意）。並進而協助他人，恢復善性（新民）。因此，我們可以說，中國的教育思想係以人性論為出發點，認為教育應以人性為基礎。「而教育的目標，則在率性（以理智支配本能）、修道、明德、新民、以達到人生所企求的「內聖」「外王」的至善境界。」（註十三）論語上所謂「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更說明了「人」的重要性，至於人之所以能夠弘道，則有賴於教育。這種以「人」為中心的教育思想，自然可稱之為人文主義或人本主義了。

（二）施教以仁

中國歷代的教育家因為大都認為人性是善的，所以便主張應以「仁」的精神施教。孔子曾說：「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孟子亦云：「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中庸則謂「修道之謂教，」「修道以仁，」這都說明了中國古代儒家便主張實施「仁」的教育，並認定教育工作是一種仁者的工作，也就是儒家以立人極為基礎的「仁學」在教育方面的實踐。不過儒家所謂「仁」的教育，不僅是在謀求個人的發展，而且要推己及人，愛人如己。所以「孔子所講的『仁的教育』，包括立身、處世、待人和治國。換言之，孔子所講的『仁的教育』，即是教人做人的教育。這種做人的教育，不僅要修己，推而對於齊家、治國、平天下也要負起責任。」（註十四）從另一方面來看，這種「仁」的教育的出發點，當然是一種「愛人之心」。所以孟子嘗謂：「仁者愛人。」韓愈更明白的

說：「博愛之謂仁。」可見這種「仁」的教育，亦即「愛」的教育，在一種以仁愛的精神施教的環境中，學者自會有如浴春風如沾化雨的感受了。

（三）有教無類

中國自孔子開始，便提出「有教無類」的主張。所以孔子的弟子中，有世卿子弟如孟懿子南宮敬叔，賤人子弟如仲弓，大盜如顏涿聚，富裕如子貢，貧窮如顏淵，以及魯鈍如曾參，愚拙如高柴等。孔子所收門徒之眾多，及其品類之不齊，就是他實施「有教無類」教育的最好證明。孔子以後，兩漢經師聚徒講學者，申公有弟子千餘人，樓望有弟子九千餘人。又如明代的王陽明，並曾在西南苗夷之區，興學施教，可見中國自古便有教育機會平等的思想。到了國父中山先生，更特別重視教育機會的平等。曾云：「圓臚方趾，同為社會之人；生於富貴之家，即能受教育，生於貧賤之家，即不能受教育，此不平之甚也。」（註十五）所以他主張：「凡為社會之人，無論貧賤，皆可入公共學校，不特不取學膳等費，即衣履書籍，公家任其費用。盡其聰明才力，分專各科，即資質不能受高等教育者，亦按其性之所近，授以農工商技藝，使有獨立謀生之才。卒業之後，分送各處服務，以盡其能。庶幾教育之惠，不偏為富人所獨受。其貧困不能造就者，亦可以免其憾矣。」（註十六）國父主張教育機會必須平等的理由與實施辦法，實在非常充分而完善。目前世界上有些國家雖高喊教育機會平等的口號，但實際上仍有因種族、階級、貧富的差別而不能接受同等教育的現象。可見孔子和國父即在教育思想這一方面，也足夠稱為人類的先知先覺了。

(四) 因材施教

孔子在論語中曾說：「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意謂中等資質以上的人，可告以高深的道理；中等資質以下的人，便不必告以高深的道理。這種適應個性因材施教的原則，在論語一書中可以看到很多實例。如孔子學生所問的雖屬同一問題，但孔子的答語卻並不相同。禮記學記篇亦云：「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多，或失則寡，或失則易，或失則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也。」這也就是說明適應個性因材施教的道理。宋儒朱熹對此亦甚重視，如云：「教人至難，必盡人之才，乃不誤人。觀可及處，然後告之。聖人之明，直若庖丁之解牛，乃知其隙，刃投餘地，無全牛矣。」關於此點，國父說得尤為透徹。嘗謂：「質有愚智，非學無以別其才；才有全偏，非學無以成其用。有學校以陶冶之，則智者進焉，愚者止焉，偏才者專焉，全才者普焉。蓋賢才之生，或千百里而見一，或千萬人而有一，若非隨人而施教之，則賢才亦以無學而自廢，以至於湮沒而不彰。」（註十七）國父這種「量智施教」的主張，與其教育機會平等的主張是有聯帶關係的。因為國父所謂教育機會平等，並非人人受完全相同的教育，而是按各人天賦資質的智愚全偏，予以接受「性之所近」的教育之機會。這樣教育上的平等，才是「真平等」而非「假平等」。可見適應個性因材施教，不僅是一種教學上所應採取的原則，而且也是促進教育機會平等最合理的途徑。

(五) 知行一貫

教育的目的不僅在使受教者獲得各種知識，而且要使受教者將已獲得的知識表現於個人的行為。論語開宗明義即說：「學而時習之。」中庸亦謂：「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這均在說明行的重要與知行一貫的道理。在中國歷代的教育家看來，「行」毋寧較「知」更為重要。例如孔子嘗謂：「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又說：「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汎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又說：「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宋儒朱熹也說：「學之之博，未若知之之要，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實」。這都是強調「行」的重要的。至於知與行的關係，明代王陽明說得最為透徹，嘗謂：「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會得時，只說一個知，已自有行在；只說一個行，已自有知在。」國父中山先生創立知難行易學說，在實質上與陽明知行合一之說並無衝突，其本意仍在鼓勵國人實踐力行，如在論治學的方法時說：「不去行，便無法可以證明所求的學問是對與不對，不去行，於是所求的學問便沒有用處。」中國數千年來這種「知行一貫」的思想，和現代西方特別注重實驗與求證的科學精神是完全符合的。

（六）學以致用

中國自古以來，教育上便有一種「學以致用」的思想。而教育與政治的關係，亦極為密切。因為「為政在人」，故優良的政治必須以優良的教育為基礎。歷代政府辦理教育的主旨，亦均在為國家培養所需要的人材。宋代王安石曾云：「所謂教之之道何也？古者天子諸侯，自國至於鄉黨，皆有學：

：士所觀而習者，皆先王之法言德行治天下之意；其材亦可以為天下國家之用。苟不可以為天下國家之用，則不教也；苟可以為天下國家之用者，則無不在於學，此教之道也。」（註十八）但學校所教育的人材，必須經由政府運用一種公平揀選的方法，始克蔚為國用，達到政治上「賢者在位，能者在職」的理想。中國隋唐以前，學校與選舉並行（如漢代之選舉賢良方正）；自隋唐以迄清末，學校與科舉並行。現今則實施五權憲法，政府更有完備的考試制度。蓋學校所以培育人材，考試所以揀用人材。中國數千年來對育才與用才二者，均加以同等重視，使之相互配合。在這種有教無類的全民教育與公平競爭的考試制度下，每一國民皆可憑其才智與努力獲得「人盡其材」與「材盡其用」的機會，達到「學用合一」的目的。國父中山先生在民權主義第六講中曾說：「歷代舉行考試，拔取真才更是幾千年的特色。外國學者近來考察中國的制度，便極讚美中國考試的獨立制度，也倣效中國的考試制度去拔取真才，像英國近來舉行文官考試，便是說從中國倣效過去的。」中國數千年來教育制度與考試制度的密切配合，不僅使教育的目的與政治的目的能夠一貫；而且也充分顯示了中國教育上和政治上人人平等的精神。

（七）尊師重道

中國自古君師並尊，學術上的導師與政治上的領袖受到社會同等的敬重。故禮記學記篇曾云：「能為師然後能為長，能為長然後能為君。故師也者，所以學為君也。是故擇師不可不慎也。記曰：『三王四代唯其師』，此之謂乎。」又云：「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是故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為尸則弗臣也，當其為師則弗臣也。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

北面，所以尊師也。」學記上這兩段話主要的意思是說，虞夏殷周四代，對教師的選擇都很慎重。因為必先教師受到尊敬，然後真理才能受到重視，所以君主不應以對待屬下的態度對待教師。即在大學裏，身為師傅的大臣對天子講學時，也不必北面居於臣位，這都是為了表示對教師的尊敬。荀子大略亦說：「國將興，必貴師而重傅；貴師而重傅，則法度存。國將衰，必賤師而輕傅，賤師而輕傅，則人有快（即放肆而輕法度之意），人有快則法度壞」。所以尊師重道，乃是中國傳統的教育精神。唐代的韓愈，曾撰有「師說」一文，闡述教師的重要與責任。而歷代大儒，亦莫不重視師弟的關係。國父和蔣總統在其教育言論中，更有「弘揚師道」與「師資第一」的昭示。至於中國之有國定的教師節，或許也是世界其他國家所少見的。數千年來這種尊師重道的傳統精神，實在是我們中國教育思想上的一大特色。

（八）確立宗旨

大體上說，中國教育思想與西方教育思想似乎有一不甚相同的地方，即中國的教育家比較重視教育的宗旨或目標，而西方的教育家比較重視教育的方法或技術。中國最早一部講述大學教育的著作是「大學」，這本書開宗明義便說：「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可見當時的著者在談大學教育時，首先便明確的指出了大學教育的宗旨。又如孟子滕文公篇中說：「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這也是說明了「明人倫」乃是三代學校的教育宗旨。因為教育必須先立宗旨，然後才能確定發展方向，使教者學者奉為圭臬，舉國同風。漢代董仲舒最大的貢獻，即在向武帝建議，正式制定「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教育政策，

樹立兩千年來以儒家學說為中心的教育思想，使中華文化從此有了一種正確的發展方向。其後朝代雖迭經變更，但每一朝代所實施的教育，亦仍然都是儒家傳統的「倫理之教」。自 國父推翻滿清建立民國後，遂以三民主義為國家的教育宗旨。因為我們二千多年以來一直有著一種正確的教育宗旨，所以教育能獲得健全的發展。反觀西方歐美等國，因歷史背景與文化傳統關係，不僅不易產生全國一致奉行的教育宗旨，甚至有些教育家高唱教育無目的的論調。而各個學校亦常以人事變更，難有較長時期一貫不變的教育方針。今日歐美各國青年之徬徨苦悶，學校之動盪不安，因素固甚複雜；但教育之缺乏宗旨或方針，實為其主要原因之一。故近人梁啟超於其所撰「論教育當定宗旨」一文中曾謂：「宗旨一偏，其流弊中於人心，往往有數十年數百年而不能拯其失者。……夫偏猶不可，何況於誤。誤猶不可，何況於無。」（註十九）由此看來，中國重視教育宗旨的思想，是極為正確的。

（九）均衡發展

中國古代實施的教育，是一種六藝之教。用現代的教育術語來說：六藝中的「禮」，相當於現今的德育和群育；「樂」，相當於現今的美育；「射御」，相當於現今的體育；「書數」，相當於現今的智育。孔子嘗謂：「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可見自孔子開始實施的，即是一種均衡發展（五育並重）的教育。而「中國古代的大學，亦以「由博返約」與「明體達用」為其教育理想。也就是現在所謂通才教育與專才教育之兼顧與適當配合。」（註二十）所以中國自古以來，教育的原則一向是知行並重、術德兼修、文武合一的。至於在教育方法上，既不採取絕對的嚴格主義，亦不採

取絕對的放任主義，使紀律與自由，相成而不相反。亦即自由之中有紀律，紀律之下有自由。這與歐美國家教育往往偏向極端主義的情形，頗有不同。他們由於教育上採取了極端主義，也就給國家帶來很多的災難。如二次大戰前的德國與日本，軍國主義的教育幾於導致亡國的悲劇。而現今世界上又有些國家，誤解自由主義的真諦，造成學校青年的放縱，社會秩序的紊亂，成為國家很大的隱憂。同時一般國家都只知發展自然科學與技術，不重人文學科與道德教育，更是世界人類文化的危機。中國的傳統思想特重中庸之道，所以教育上一切設施，亦以「不偏不倚」，「無過無不及」為原則。中國這種均衡發展合乎中道的教育，充分表現了中國文化優良的傳統精神。

(十) 促進大同

根據比較教育的研究，我們可以知道，在教育思想上，有的國家傾向個人主義，有的國家傾向國家主義。自然還有其他各種不同的主義或思想。可是卻很少像我們中國，從禮運的大同篇到國父的三民主義，都是以促進世界大同為教育的終極目標的。因為中國人對於世界自古便有一種崇高的理想，那便是「大學」一書中所說的「平天下」的觀念。大學把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等八條目，作為人生由內到外不斷開展的過程，而在此過程中，修身處於一種關鍵的地位。故云：「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惟「以言修身之道，則在好學以達於智，力行以達於仁，知恥以達於勇。」（註二十一）國父亦謂：「要用固有的和平道德做基礎，去統一世界，成一大同之治。」可見歸根結底，還是一個教育問題。所以中國現行的教育宗旨明白指出：「中

華民國之教育，根據三民主義，以充實人民生活，扶植社會生存，發展國民生計，延續民族生命為目的，務期民族獨立，民權普遍，民生發展，以促進世界大同。」這也就是中國國歌上所說「以建民國，以進大同」的道理。由此看來，中國自古迄今，一直認為教育應以發展人性培養人格為最初起點，以建設國家促進大同為終極目標。而此一貫的教育思想，亦即孔子的「仁的教育」思想。這種教育思想所代表的崇高偉大的精神，是我們應該繼續加以發揚光大的。

四 中國教育思想與世界文化前途

從歷史發展的趨勢來看，人類文化總是不斷向前進步的。但是如果遇著一股阻礙進步的逆流，則文化的發展仍難免不發生一種停滯甚至倒退的現象。歐洲過去所經歷的一段「黑暗時代」，便是一個很顯明的實例。

近代由於自然科學與應用技術的突飛猛進，世界各方面隨著知識的爆發而在迅速改變之中。一方面人類的物質享受可以獲得充分的滿足，另一方面人類的精神生活卻感到意外的空虛。這種物質與精神失去平衡的結果，便造成了今日世界文化極大的危機。

要想挽救這種文化的危機，不是單從政治或經濟方面可以找到解決辦法的。必須由思想方面，做一種正本清源的工作。所以英國哲學家羅素（Bertrand Russell）在其所著「世界之新希望」（*New Hopes for a Changing World*）一書中曾說：「今日世界問題的最大困難在於心理因素，心理因素的改

變則有賴於教育。」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約章內，亦曾明白宣示：「戰爭既發動於人心，故和平之壁壘，仍須建築於人心。……文化之傳播與交流，及正義自由與和平之教育，為人類尊嚴所必需。此為一種神聖之責任，各民族應以關切互助之精神求其完成。」

由此可見，大家都認為今日的世界問題，在根本上，乃是一個思想問題，而解決人類思想問題，則不能不從教育入手。那麼，今後應該實施怎樣一種教育才能有助於解決世界問題呢？無可諱言的，現在一般人總覺得只有歐美各國的教育才是最進步的教育，因而也以為只有採行歐美式的教育才是一種最正確的途徑。可是在我個人看來，卻並不完全如此。固然歐美各國在教育方法上，因為利用科學技術的最新工具，可以發揮很大的效能。但也正由於受自然科學研究方法的影響，過度信賴數量的、分析的研究結果，忽略了教育活動本身的特色，陷入機械唯物的窠臼。殊不知教育是一種「人性」的「自覺」的工作，其對象並非同於一般的物質或其他的動物，教育的研究應著重於從統整的、價值的方面，瞭解人性，因材施教。而在另一方面，歐美教育今日還有一種很大的缺點，即過於注意教育方法的研究，而忽略教育目的的肯定。甚至有些教育家提出「教育無目的」的主張。試想一個國家的教育倘若無確定的目的，則其所採用的教育方法不管如何新穎進步，恐亦難收到預期的教育效果。至於我們中國的教育，過去由於只注意到關於「人」的問題的研究，忽略了關於「物」的問題的研究，以致科學技術落後，國力無由發展。今後自須加強科學教育與研究工作，期能迎頭趕上歐美科學發達的國家。同時，在教育方法上，我們自然也應採用歐美各國的新式設備與技術，加以不斷改進。但是思

想問題究屬一切問題的根本，而教育思想尤與世界文化前途具有密切關係。就現代各國教育思想的比較觀點來看，我認為我們中國的教育思想實在是解決今日世界文化問題最為需要的一種教育思想。茲試加分析說明如下：

(一)中國重視人性的人本主義教育，以及心物合一的哲學思想，對西方偏重功利的實用主義教育以及唯物主義的哲學思想，實具有補偏救弊的效用。

(二)中國傳統的「仁的教育」思想，和「有教無類」的主張，對西方極權國家的階級教育與專講鬥爭不講互助的思想觀念，正是一劑拔本塞源的良藥。而且只有實施這種仁的教育才能使世人真正了解「有道德始有國家，有道德始成世界」(註二十二)的道理。

(三)中國對教育機會平等的理想，有具體而完善的實施辦法。如國父所主張的「量智施教」與公費教育，即最為徹底而合理。今日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表面上雖高唱教育機會平等，但實際上貧苦青年並不能與富家子弟有同等進入學費昂貴的大學的機會。近年美國及日本一部份大學學生因繳不起學費而進行罷課運動，即其一例。可見許多資本主義國家所謂的教育機會平等，只是假平等而非真平等。國父的教育主張，實在可以補救他們現有的缺點。

(四)中國的教育家認為教育方針比教育方法更為重要，因為教育方法不當，隨時可以糾正或變更。如果教育方針錯誤，則會發生鉅大而久遠的影響。西方國家因多未能確立一定的教育方針，以致近年一般大學學生思想紛歧，學潮迭起，甚至學校變為共產主義的溫床。我們中國這種認為教育應先確立

宗旨的主張，似可供西方國家的借鏡。

(五)中國教育方面有一極為優良的傳統精神，即是尊師重道。故數千年來，師生之間，一直保持親密的關係。西方國家最初視教師如僕役，現則對待學校教師和對待一般勞工一樣，甚少尊敬之意。因而教師亦如其他勞工，常為爭取待遇而罷工。至於師生之間，儼如路人，遂致原為研究學術的學府，逐漸變為買賣知識的市場。影響所及，自然使社會上重利輕義，富而不安。故歐美若干教育界人士在中國參觀訪問後，大都表示中國此種尊師重道之傳統精神，值得西方國家特別重視。美國加州近曾建議亦以孔子誕辰定為該國的教師節，當係受中國此一傳統教育思想的影響。

(六)中國教育以促進世界大同為終極目標，向無狹隘的國家主義思想。第二次世界大戰之發生，即係德、義、日本等國實施軍國主義教育之結果。今後各國為消除戰爭的根源，打破弱肉強食的觀念，必須先在教育方面，鼓吹中國傳統的大同思想，加強國際文化交流與學術合作，以增進各民族間之相互瞭解與友誼。只有實施這種以促進大同為終極目標的教育，才能達到羅素所謂「從人類心理上來解決世界問題」的目的，實現中國儒家「為萬世開太平」的理想。

總之，中國自 國父倡導國民革命以來，由過去專重倫理的教育思想，演變而為兼重倫理、民主、科學三者的教育思想，乃是一種很大的進步。因為這種以三民主義為中心的教育思想，一方面淵源於中國文化的優良傳統精神，一方面也包涵了西方現代學術思想的精華。也可以說，這是中西文化一種新的綜合。因此，我們應該相信：中國三民主義的教育思想，不僅可以挽救今日世界文化的危機，

而且也將有助於促進大同理想的實現。

附註：

註一：據尚書舜典的記載，虞時即設有學官，管理教育事務。如以契為司徒，敬敷五教；由夔典樂，教導音樂和詩歌；由伯夷任秩宗，主持三禮。

註二：漢武帝時創太學，選聘年高德劭學優者任教授，稱為博士，招收學生，隨教授學習，稱為博士弟子。太學的課程，以通經致用為主。學生分經受業，經考試及格，任用為政府官吏。詳見吳俊升撰「中國大學教育的特色」一文。

註三：歐洲幾所最早的大學，如意大利之薩列諾大學設於一〇六〇年，波羅尼大學設於一一五六年，英國牛津大學設於一一四〇年，法國巴黎大學設於一二〇〇年，各校自創立迄今，均不足千年。

註四：見楊亮功著「中西教育思想之演進與交流」。

註五：見崔載陽著「現代教育思想」。

註六：見國父著「中國革命史」。

註七：見蔣總統講詞「三民主義之體系及其實行政序」。

註八：見國父手著本「三民主義」。

註九：見蔣總統「革新教育注意事項」手令。

註十：見蔣總統講詞「教育救國與救國教育」。

註十一：見蔣總統講詞「復國建國的方向與實踐」。

註十二：見國父著「孫文學說」。

註十三：參閱陳立夫講詞「何謂修道之謂教」。

- 註十四：見楊亮功著「中西教育思想之演進與交流」。
- 註十五：見 國父講詞「社會主義之派別及批評」。
- 註十六：見 國父講詞「社會主義之派別及批評」。
- 註十七：見 國父民國前十八年「上李鴻章書」。
- 註十八：見王安石臨川集卷卅九。
- 註十九：見梁啟超飲冰室文集。
- 註二十：見吳俊升撰「中國大學教育的特色」。
- 註二十一：見陳立夫著「四書道貫」總論。
- 註二十二：見 國父講詞「學生須以革命精神努力學問」。